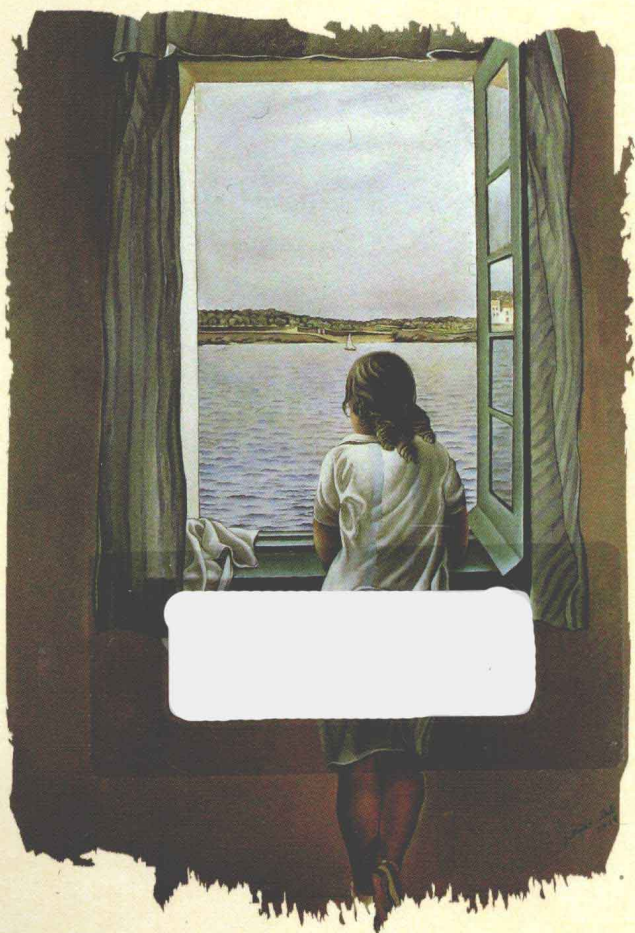


笔会年选，希望成为更多人的心灵史记

坐在人生的边上



文 匯 出 版 社

笔会文粹

坐在人生的边上

文 匯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坐在人生的边上：2011 笔会文粹 / 文汇报笔会编辑部主编. —上海：文汇出版社，2012. 7
ISBN 978 - 7 - 5496 - 0567 - 5

I. ①坐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
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46958 号

坐在人生的边上
——2011“笔会”文粹

选 编 / 文汇报“笔会”编辑部
责任编辑 / 何 璟
装帧设计 / 周夏萍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/ 上海新文印刷厂
版 次 / 2012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640 × 960 1/16
字 数 / 270 千
印 张 / 20.25

ISBN 978 - 7 - 5496 - 0567 - 5
定价：33.00 元

目录

高处的声音

- 杨 绛 坐在人生的边上 / 3
黄永玉 你是谁（外一篇） / 11
黄 裳 永玉的来访 / 15
附：陈长林 陈寅恪归葬庐山书报有载 / 18

会思想的芦苇

- 严 锋 社交时代 / 23
周振鹤 阿美利加、纽约库、阿塔库 / 25
俞孔坚 水 殇 / 28
曹明华 “转基因”之争在美国 / 31
附：陈蓉霞 需要听听生态学家怎么说 / 36
唐 韧 嫉妒的真相 / 40
柳延廷 “异常糊涂的聪明人” / 43
郑若麟 不敢苟同“伏尔泰名言” / 45
刘厚生 浪费难道也是贡献？ / 49
张业松 两个刺激和一个结论 / 53

- 留 白 大学与大树 / 57
陈世旭 如果有钱请托翁定居 / 61
邵元宝 消失的文人 / 63
陈 晶 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 / 65
邵燕祥 也谈文物性建筑的搬家 / 68
王周生 更有尊严的病名 / 71
陈 弘 医与患 / 74

怀 人 集

- 罗达成 敬畏梅朵 / 79
陈思和 章培恒先生 / 84
周玉明 老马，您慢些走…… / 88
吴 越 老实人的“传奇” / 93
朱正琳 学习死亡 / 99

谈 艺 录

- 躲 斋 书法要有自己的面目，谈何容易 / 105
胡晓明 《富春山居图》为何画了这么久？ / 108
林 茨 知性原于何处 / 111
马慧元 “衰退期”和我们自己 / 117
扬之水 香识二题 / 120
谈瀛洲 养心种山茶 / 123
李 皖 就当他们是“小清新” / 126

人与行·人与史

- 冯骥才 背上一块石头落下来 / 135
赵 川 乡村建筑师 / 139
黄黑妮 造桥，蓝草计划，及负责任的旅游 / 143
吴建国 玩的不是心跳 / 151
伍 隼 胡乔木和西湖 / 154
施海荣 王一亭创办的上海孤儿院 / 159
袁冬林 母亲浦熙修的一段自述 / 162
李天纲 “友道”跨文化 / 165
吴学昭 怀念母校上海工部局女中 / 169

日 常

- 李 娟 山羊会有的一生 / 177
刘庆邦 兔子的精神 / 181
迟子建 带笤帚的小鸟 / 184
曹 雷 怀念邮递员的敲门声 / 187
何立伟 当年素笺有余温 / 190
徐敏霞 乡愁蓝调 / 193
赵 霞 童年·记忆·身体 / 197
王 蒙 尴尬风流 / 200
刘心武 的哥青岭 / 203
张 莹 校工邵师傅 / 205
戴 冰 表弟小涛 / 209

地 球 村

- 汪涌豪 垂注于断念达观之美 / 217
恺蒂 摇滚·传奇·参与 / 222
林达 丹尼莫拉的“好贼教堂” / 226
李黎 巴别塔下的笑话 / 229
程新国 在比利时造幢小房子 / 233
卓今 日本厨房里的那些活计 / 239
裘山山 十二个细节 / 243
黄霄翎 灰狗 / 246
边芹 卢瓦河以南，地中海以北 / 252
黄德海 追随内心的眼睛 / 256

书 香

- 铁凝 爱与意志 / 261
毕飞宇 勒克莱齐奥的“贴身内衣” / 263
袁志英 纳粹时代的德国阅读 / 266
赵昌平 天香·史感·诗境 / 270
何频 布谷、《古炉》和方言写作 / 274
叶扬 人 心 / 278
顾骧 这一代 / 281
孙郁 张爱玲与汪曾祺的眼光 / 284
张大春 剩下几个字 / 289
张定浩 携手上河梁 / 293

张新颖 翠翠，在杜鹃声中想起我 / 296

雍 容 “三上” / 298

译 文

陈淑贤(译) 父亲与音乐 / 303

莉亚·普莱斯[美] 黄星焯(译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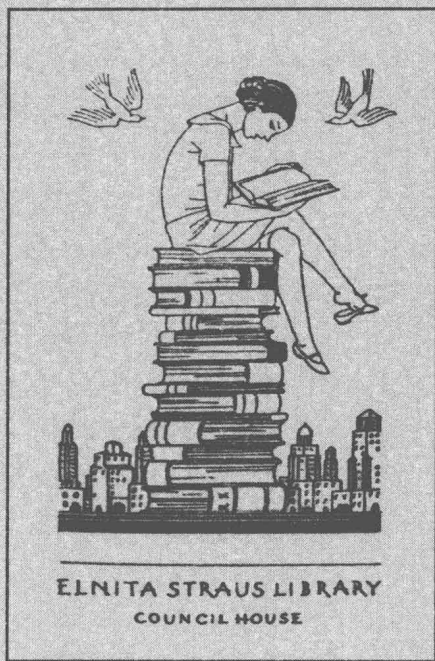
书能致病，亦能治病 / 306

谈 珩(译) 我写作，为一小撮不满足于消磨时光的人
/ 309

附：谈 珩 为“自由”所束缚 / 311

高处的声音

GAOCHU DE SHENGYIN



坐在人生的边上

——杨绛先生百岁答问(节选)

周 毅

杨绛先生近年闭门谢客，海内外媒体采访的要求，多被婉辞；对读者热情的来信，未能一一回复，杨先生心上很感歉疚。朋友们建议先生在百岁生日来临之际，通过答问与读者作一次交流，以谢大家的关心和爱护；杨绛先生同意，并把提问的事交给了年来投稿较多、比较熟悉的《文汇报·笔会》。我获此机会，有幸与杨先生作了以下笔谈。

1

笔会：尊敬的杨先生，请允许我以提问来向您恭祝百岁寿辰。

您的生日是1911年7月17日。仔细论起来，您出生时纪年还是清宣统三年，辛亥革命尚未发生。请问，7月17日这个公历生日您是什么时候用起来的？

杨绛：我父亲是维新派，他认为阴历是满清的日历，满清既已推翻，就不该再用阴历。

他说：“凡物新则不旧，旧则不新，新旧年者，矛盾之辞也，然中国变法往往如是。旧法之力甚强，废之无可废，充其量不过增一新法，与旧法共存，旧新年特其一例而已。”“今人相问，辄曰：‘汝家过旧历年乎，抑或新历年乎？’答此问者，大率旧派。旧派过旧历年，新派过新历年。但此所谓过年，非空言度过之谓，其意盖指祭祖报神……今世年终所祭之神，固非耶教之上帝，亦非儒家之先圣先贤，不过五路财神耳。此所谓神，近于魔鬼，此所谓祭，近于行贿。”

7月17日这个公历生日是我一岁开始用起来的。我一岁时恰逢中华民国成立。我常自豪地说：“我和中华民国同岁，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一百天！”7月17日是我生日，不是比10月10日早一百天吗？

笔会：您从小进的启明、振华，长大后上的清华、牛津，都是好学校，也听说您父母家训就是：如果有钱，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。杨先生，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“好的教育”？

杨绛：教育是管教，受教育是被动的，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，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，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，说“这孩子该上学了”。孩子第一天上学，穿了新衣新鞋，拿了新书包，欣喜地“上学了！”但是上学回来，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，除非老师哄得好。

我体会，“好的教育”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，学习的自觉性，培养人的上进心，引导人们好学，和不断完善自己。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，让他们潜移默化。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，言传不如身教。

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，由淘气转向好学的。爸爸说话入情人理，出口成章，《申报》评论一篇接一篇，浩气冲天，掷地有声。我佩服又好奇，请教秘诀，爸爸说：“哪有什么秘诀？多读书，读好书罢了。”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，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，现代小说，读得津津有味。我学他们的样，找父亲藏书来读，果然有趣，从此好（hào）读书，读好书入迷。

我在启明还是小孩，虽未受洗入教，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，小小年纪便懂得“爱自己，也要爱别人”，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“我要爱人，莫负人家信任深；我要爱人，因为有人关心”。

我进振华，已渐长大。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，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，为办好学校“嫁给振华”贡献一生的事迹，使我深受感动。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。

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，我是通过他的行动，体会到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古训的真正意义的。他在京师高等

检察厅厅长任上，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，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。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，有位军阀到上海，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，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人欢迎者的名单，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，说“名与器不可假人”，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。上海沦陷时期，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，视而不见，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。

我们对女儿钱瓊，也从不训示。她见我和锺书嗜读，也猴儿学人，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，居然渐渐入道。她学外文，有个很难的单词，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，跑来问爸爸，锺书不告诉，让她自己继续查，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。

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。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，送给两岁的小朋友，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，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，问他签名干什么，小孩说：“您签了名，这画才值钱！”可惜呀，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，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？

笔会：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“新女性”，和钱锺书先生结婚后，进门却需对公婆行叩拜礼，学习做“媳妇”，连老圆先生都心疼自己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宝贝女儿，在钱家做“不花钱的老妈子”。杨先生，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？您可有什么良言贡献给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？

杨绛：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“媳妇”，从旧俗，行旧礼，一点没有“下嫁”的感觉。叩拜不过跪一下，礼节而已，和鞠躬没多大分别。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，那么，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，不合适不要结婚。

抗战时期在上海，生活艰难，从大小姐到老妈子，对我来说，角色变化而已，很自然，并不感觉委屈。为什么，因为爱，出于对丈夫的爱。我爱丈夫，胜过自己。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，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，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、创造力而牺牲自己。这种爱不是盲目的，是理解；理解愈深，感情愈好。相互理解，才有自觉的相

互支持。

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。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，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。锺书说他“没有大的志气，只想贡献一生，做做学问”。这点和我志趣相同。

我成名比钱锺书早，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，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“杨绛的丈夫”。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，比自己有价值。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，能够和《围城》比吗？所以，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，我不仅赞成，还很高兴。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，致力写作，为节省开销，我辞掉女佣，做“灶下婢”是心甘情愿的。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，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，一会儿又烫起了泡。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，使我很自豪。

钱锺书知我爱面子，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，特陪我同去小菜场。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，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。他怕我太劳累，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，当然洗得一塌糊涂，统统得重洗。他的体己让我感动。

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“誉妻癖”，锺书的确欣赏我，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，对我的鼓励很大，也是爱情的基础。同样，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、熟悉，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《围城》搬上银幕，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，我觉得应表达《围城》的主要内涵，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，那就是：

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，

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

对婚姻也罢，职业也罢，

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

意思是“围城”的含义，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，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，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。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，觉得这个关键词“实获我心”。

我是一位老人，净说些老话。对于时代，我是落伍者，没有什么

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。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，想提醒年轻的朋友，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，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，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、支持和鼓励，两情相悦。我以为，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，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，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。门当户对及其他，并不重要。

笔会：您出生于1911年，1917年即产生了新文学革命。但您的作品，不论是四十年代写的喜剧，还是后来写的《洗澡》《干校六记》等，却没有一点通常意义上“现代文学”的气息。请问杨先生，您觉得您作品中和时代氛围的距离来自哪里？

杨绛：新文学革命发生时，我年纪尚小；后来上学，使用的是政府统一颁发的文白掺杂的课本，课外阅读进步的报章杂志作品，成长中很难不受新文学的影响。不过写作纯属个人行为，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个性、情趣和风格。我生性不喜趋时、追风，所写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。我也从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“现代气息”，如果说我的作品中缺乏这种气息，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，上承传统，旁汲西洋，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太重。

笔会：创作与翻译，是您成就的两翼。特别是历经“大跃进”、“文革”等困难年代、最终完成《堂吉珂德》的翻译，已是名著名译的经典，曾作为当年邓小平送给西班牙国王的国礼。很难想象这个工作是您47岁自学西班牙语后开始着手进行的。您对堂吉珂德这位骑士有特别的喜爱吗？您认为好的译者，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门外语更重要？

杨绛：这个提问包含两个问题。我先答第一个。

我对这部小说确实特别喜爱。这也说明我为什么特地自学了西班牙语来翻译。堂吉珂德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，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，明明是风车的翅膀，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。他一个瘦弱老头儿，当然不是敌手，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，就非常了不起了。又如他面前沙尘滚滚，他看见的是迎面而来的许多军队，难为他博学多才，能数说这许多军队来自哪些国家，领队的将军又是何名何姓。这

等等都是象征性的。

我曾证明塞万提斯先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所以他的遗体埋在三位一体教会的墓园里；他被穆尔人掳去后，是三位一体教会出重金把他赎回西班牙的。虽然他小说里常有些看似不敬之辞，如说“像你妈妈一样童贞”，他也许是无意的，也许是需要表示他的小说不是说教。但他的小说确是他信仰的产物。

现在我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。

“作为好的译者，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语更重要？”

是的。翻译是一项苦差，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，不能自作主张，而且一仆二主，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：一是原著，二是译文的读者。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；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，还需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，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。另一方面，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，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，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；内容不可有所增删，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。原文弦外之音，只能从弦上传出；含蕴未吐的意思，也只附着在字句上。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，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。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，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，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，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。彻底了解不易，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地表达更难。

末了我要谈谈“信、达、雅”的“雅”字。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，“雅”是外加的文饰。最近我为《堂吉河德》第四版校订译文，发现毛病很多，有的文句欠妥，有的辞意欠醒。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，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、也更好些。

“好”是否就是所谓“雅”呢？（不用“雅”字也可，但“雅”字却也现成。）福楼拜追求“最恰当的字”（Le mot juste）。用上最恰当的字，文章就雅。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：不仅能信能达，还要“信”得贴切，“达”得恰当——称为“雅”也可。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，但是我相信，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这么一个目标。

笔会：杨先生，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，最能依恃的品质，最值得骄傲的品质，能让人不被摧毁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？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、向上之气来自哪里？

杨绛：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，是肯吃苦。因为艰苦孕育智慧；没有经过艰难困苦，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。有了亲身经验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。

我的“向上之气”来自信仰，对文化的信仰，对人性的信赖。总之，有信念，就像老百姓说的：有念想。

抗战时期国难当头，生活困苦，我觉得是暂时的，坚信抗战必胜，中华民族不会灭亡，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。我写喜剧，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。

我们身陷上海孤岛，心向抗战前线、大后方。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，都抱成团。如我们夫妇，陈西禾，傅雷，宋淇等，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，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。我们同自愿参加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作家、文化人泾渭分明，不相往来。

有一天，我和钱锺书得到通知，去开一个不记得的什么会。到会后，邻座不远的陈西禾非常紧张地跑来说：“到会的都得签名。”锺书说：“不签，就是不签！”我说：“签名得我们一笔一划写，我们不签，看他们怎么办。”我们三人约齐了一同出门，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扬长而去，谁也没把我们怎么样。

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支撑我驱散恐惧，度过忧患痛苦的，仍是对文化的信仰，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，忍受抄家、批斗、羞辱、剃阴阳头……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。我绝对不相信，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，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，会泯灭人性，就此沉沦。

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“牛鬼”境遇出发，对外小心观察，细细体味，一句小声的问候，一个善意的“鬼脸”，同情的眼神，宽松的管